



责编 刘洋 美编 贾从丛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949 bbtzbs@163.com

## 两会三人行

## 金融促消费做好供给侧

我国消费市场正迎来金融的深度赋能。国家财政贴息红利持续释放、金融机构电商企业合力“搭台”、消费金融产品持续创新,不仅让青年群体、“信用白户”、新市民等群体享受到更便捷的金融服务,也助力消费市场实现“敢消费、愿消费、健康消费”的良性循环。

在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期间,多位委员在谈及金融促消费话题时提到,促进消费需要精准施策,可通过有效的财政金融协同,减轻特定群体的消费成本。金融体系应积极创新信贷产品,抓住年轻人的痛点,为其打造更多元、更友好的金融产品,在当前环境下敢消费。同时,多位委员建议,金融促消费,要跳出“单纯放贷刺激消费”的传统思路,而要从事供给侧发力、差异化产品设计、让金融工具深度嵌入消费场景,推动首都消费提质扩容。

政协委员李志起:  
瞄准年轻人做差异化

从缓解特定群体压力、撬动消费意愿,到适配市场结构、支持场景创新,再到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市场秩序,金融政策在促进消费中扮演着多维角色。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推动金融资源更加普惠、精准、安全地流向消费领域,不仅是短期提振市场信心的有力抓手,更是夯实内需基础、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

来自工商联界的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指出,促进消费需要精准施策,其中金融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希望有更多的国补政策,能够降低年轻消费者的负担。同时,应通过有效的财政金融协同,直接降低特定群体的消费成本。

近日,财政部等多部门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纳入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在李志起看来,类似政策直击年轻群体痛点,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在当前环境下敢于消费,不必过度担忧后续的还款压力。

聚焦首都北京的消费市场,李志起分析了其鲜明的结构特征。他认为,北京拥有庞大的银发经济群体、数量众多的高校青年与学生群体,以及对子女消费投入可观的家长群体,三者共同构成了消费主力军。这意味着,金融服务的创新也必须随之细分和差异化,为不同生命阶段、不同消费偏好的群体提供定制化的支付、信贷、财富管理及保险解决方案。“把这三类人群给抓住,金融服务和产品根据他们的喜好去定制,我觉得北京消费其实大有潜力。”李志起说道。

具体如何实现这种差异化?李志起认为,关键在于数据驱动下的精准洞察。“首先就是要通过数据,找出消费者的差异化喜好。”例如,针对在年轻群体中兴起的“一人食”餐饮模式,或针对老年人日益旺盛的兴趣学习、文旅体验需求,金融产品与服务可以深度嵌入这些新兴消费场景,提供场景化、便捷化的金融支持,从而助力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

在鼓励消费的同时,倡导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同样不可或缺。对此,李志起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消费者自身需提升金融素养与鉴别能力,警惕消费陷阱;金融监管部门应对过度营销、潜在风险较高的消费模式保持严格的监管态势,不能让其成为一个“圈钱”的

游戏;行业内部应加强自律,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规范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健康的消费金融生态。

政协委员张蔚茜:  
金融促消费不在多借钱

在北京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期间,来自民革界的政协委员、国泰海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张蔚茜在谈到“金融促消费”话题时提到,当前消费市场的运行逻辑与以往有所变化。

具体到北京,张蔚茜认为,北京市整体消费结构已接近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传统衣食住行和家电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提升空间相对有限;但数字消费、文化消费、精神消费,以及家政、养老、育儿等服务型消费,仍然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我认为金融促消费政策的重点,应更多放在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领域。”张蔚茜表示,金融促消费,关键不在多借钱而在做好供给侧,现在的矛盾不是大家没需求,而是高品质的服务供给不足,例如如好的养老、托育、医疗服务。如果金融机构只是给消费者发信用贷款,那只是在透支未来;但如果金

融能够通过中长期资金,支持这些领域的优质供给建设,就能从根本上增强居民的长期消费信心。

例如,金融机构可以利用长期资金优势,在北京周边地区,例如怀柔、密云等地,投资或参与建设高品质养老社区,在此基础上,设计与之匹配的养老金融产品。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金融—服务—消费”的长期闭环:金融资金找到了稳定、可持续的投资方向;养老服务获得了长期资金支持;居民也获得了可预期、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金融机构,不仅是资金的管理者,更应成为美好生活的服务提供者和组织者。当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把钱交给金融机构,不但是保值增值,而是可以直接换来更安心、更有品质的生活,消费的信心和动力自然就会回来。

政协委员黄轶:  
锚定三大核心领域

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如何将金融政策工具与消费市场潜力有效结合,通过精准滴灌激发内需活力,是摆在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立足消费升级趋势,来自经济界的政协委员、北京美臣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中关村智能科技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黄轶表示,金融促消费政策首先可锚定大宗、服务、新型消费三大核心领域,聚焦北京新能源汽车、冰雪文旅、银发育儿等特色场景,针对汽车、家电家居推出贴息贷、分期免息,为文旅体育打造场景化金融产品,此外还可给中小微消费商户开展首贷贴息、信用贷扩容,实现供需两端协同发展。

而让政策精准触达,在黄轶看来,关键

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场景深度嵌入,把金融产品嵌入到商超、车企、社区等消费全流程,实现支付端一键申请、便捷使用;二是分层靶向施策,依托北京大数据建立精准用户画像,为新市民、银发族、青年等群体定制专属金融服务;三是政银商协同让利,通过财政贴息+银行让利+商户优惠形成闭环,同时打造北京特色消费金融品牌,叠加现有民生、置换补贴政策,让金融服务融入一刻钟生活圈、重点商圈。最终让金融政策红利实实在在地落到消费者手里,真正成为提振首都消费的有力抓手。

金融产品在推向市场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黄轶认为,可通过大数据精准画像,将人们的日常消费习惯、信用程度与当前促消费手段结合,实现精准便利、风险可控的目标。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个人信用修复政策作用。近年来,个人信用修复政策重磅落地,征信系统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逾期信息并调整展示状态,无论是信用卡、房贷还是消费贷,只要满足“2020—2025年逾期、单笔≤1万元、2026年3月底前结清”三大条件,均可享受“免申即享”的一次性信用修复福利。黄轶指出,此政策也有利于进一步打开普惠人群的消费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随着消费贷“国补”升级,多家电商平台、金融机构纷纷推出贴息优惠,消费者获得更多“真金白银”补贴。黄轶进一步表示,要继续发展深度嵌入消费场景的金融产品,可通过电商让利、金融机构让利等方式,让消费者获得更好的价格和消费体验。另外,也要推进重点商圈外卡支付全覆盖,健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与消费维权机制,让消费更安心。

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 董晗莹

## 政协记者会

政协委员建言  
首都生态协同与科创升级

1月25日,在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的题为“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的记者会上,市政协委员王文杰、聂祥仁、徐全胜、李娜、李永生,分别就聚焦“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和推进美丽北京建设、推动京津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北京超大城市治理实践和城市更新、构建体育赛事体系和推进文旅体展融合发展以及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建言献策。

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

政协委员王仲远:  
北京形成人工智能  
闭环式产业生态

自2022年末大语言模型横空出世,人工智能产业已走过三年快速发展期。三年间,从最初的技术探索与概念热潮,到逐步回归务实本质、聚焦落地效能,行业发展节奏随之悄然换挡。

在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期间,来自科学技术界的政协委员、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王仲远表示,大语言模型的基础研发步伐如今趋于平缓,产业重心向应用端加速转移,较为突出的趋势之一,便是从单智能体向多智能体系统演进。他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类比——多智能体通过相互协同配合,处理具体场景任务的效果显著优于单一智能体,成为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关键路径。

同时,人工智能正加速突破数字世界的边界,向物理世界延伸,不再局限于文字信息处理,转而向多模态模型、世界模型升级,着力攻克时空空间认知、物理常识推理等核心难题。

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转型与落地突破,离不开核心区域产业生态的深厚积淀,这也是行业务实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王仲远看来,北京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阵地,凭借全栈式生态布局,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养分。

据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的公开信息,2025年预计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500亿元,企业集聚超2500家,两项指标均占全国半数左右;领域内上市企业近60家、独角兽企业约40家,国内首个上市的国产人工智能芯片企业和大型模型企业、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均诞生于北京。

人才层面,北京入围“AI 2000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的有148人,占全国超40%,AI学者总量达1.5万人,占全国30%。

王仲远提到,顶层设计给出的接地气、全方位政策支持,叠加从底层算力芯片、中间层技术研发到顶层场景应用的完整布局,让北京形成了闭环式产业生态。而科研机构、企业与政策层面形成的合力,正推动多智能体等人工智能领域新技术、应用加速突破场景壁垒、迈向商业闭环。个人而言,他对2026年成为中国智能体爆发的关键之年充满期待。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天逸

## 两会声音

## 政协委员王喆:

## 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资源 更好增进农民福祉

土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资源,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最重要因素,盘活闲置土地不仅是破解“用地难”与“土地闲”矛盾的现实选择,更是增进农民福祉的必答题。1月25日,在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来自民盟界的政协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体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破解农村土地“沉睡”难题、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重要思路。

王喆表示,在去年市政协组织的“每月一题”调研中了解到,当前北京市京郊存在大量闲置土地。这种低效化的土地利用格局,直接导致产业项目落地难、人居环境提升空间不足、生态功能整合不畅等问题,与首善标准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求在差距。

在王喆看来,北京市农村闲置土地利用低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家底不清”与“分类模糊”并存,部分区域对闲置土地的成因、权属、规划限制掌握不细,缺乏精准分类标准;二是权责交叉导致推进缓慢,因政府规划调整、配套设施未到位等行政原因,与企业自身未按期动工等市场原因交织,责任认定难、处置协调难;三是盘活路径单一,不少闲置土地仍局限于传统“瓦片经济”出租模式,缺乏与产业升级、民生需求的有效结合。

为此,王喆建议,首先要突出规划引领,强化政策激励。一方面,以“十五五”规划编制为契机,在乡镇总体规划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框架内,围绕节约集约用地,科学修订村庄布局规划,引导土地要素重新配置,合理安排农村“三生用地”,适度形成连片土地。另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明确闲置土地盘活利用的方向、方式、重点,制定出台闲置

土地盘活利用的扶持政策,明确奖惩办法,对开展不力的村、乡镇实行年度考核“一票否决”。同时,提高收益分成,调动基层群众参与闲置土地盘活的积极性。

其二,加强政策统筹,形成工作合力。一是单独建立闲置土地盘活利用项目报批机制。现自、发改、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加强联合,优化田园综合体、村庄建设项目、三产融合项目等审批环节,针对历史遗留产权问题,设立“绿色通道”,提高审批效率。二是充分发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集成效能。常态化做好政策统筹与项目结合文章,更好发挥政策协同合力效应。三是探索退出宅基地或废弃农房基金管理办法。根据农户意愿,将退出补偿金存入基金,作为村民购买商品、获取低息贷款的依据。四是加快农村闲置土地盘活利用。充分利用产权交易平台,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闲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权等,通过租赁、购买、托管等形式

在公开市场上流转运营,形成集中连片土地资产,实现农村土地资产保值增值。

此外,坚持因地制宜,促进土地增收。一是将废弃房屋、坑塘、荒片综合整治利用,打造“闲地经济”,鼓励支持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田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绿化苗木、果树、茶叶、药材等种植,提高土地的规模化产出效益,收益由村集体、农户等协商分成。二是利用闲置土地建设厂房、冷链仓储,或统一对外招商,让创业者以租赁形式入驻乡村,或将老旧房屋改建成精品民宿,建设农家乐、休闲游乐场所。三是农户将整理出的闲置土地以入股方式交给股份合作社经营,并参与收益分红。四是鼓励就近相邻的村抱团作战,跨区域整合闲置土地,联建高标准物业项目和创新创业平台,让农村集体经济这块蛋糕越做越大,为成员收益稳步提升、合理分配奠定坚实基础。北京商报记者 董晗莹